甲午战争与浙江近代工业

沈雨梧

Between 1895 and 1900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reached its first high tide. During this short period of five years, 22 new factories and mines with capital of 3,953,000 yuan were established, a number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y. Between 1901 and 1913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national industry reached its second high tide. Some historians have argued that 1909—1910 was a period of depression and decline for this industry. But this author presents a different view, using the example of Zhejiang to portray a general situation of gradual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en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until 1913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Zhejiang's national industry was tortuou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in the 1895—1900 phase and in the 1901—1910 phase. The former period was marked by a focus on big factories and mines, while in the seco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factories and min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is shift in development patterns demonstrates the differing economic bases of the movements for reform and revolution an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100 年前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日(甲午)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总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①本文打算对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在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些探讨。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②。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在浙江也掀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的浪潮。"实业救国"，"抵制洋商洋厂"，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爱国救亡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人们投资近代化工业的热情。

甲午战争时期，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895 到 1900 年；(二)1901 年到 1913 年。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从 1895 年到 1900 年，这是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895 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杭州等地被辟为日本商埠，震动和刺激了社会各阶层，面临国土被瓜分的民族危机，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用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富强，必须走日本的道路。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主张实业救国，提出自办铁路、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的要求。加上洋务运动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遭到了失败，标志着清政府通过“官为控制”的近代企业来达到“强”、“富”的希望落空。面对现实，清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被迫作些改变，对民族资本主义作了某些让步，“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各厂局出品按照洋货入口办法，仅纳海关正税一道”。另一方面，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的输出，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也起了一些刺激作用，列宁说：“资本的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营和商品倾销获得高额利润，对浙江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这时他们在爱国救亡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纷纷在浙江投资创办近代民族工业。

甲午战争以前，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创办不多，根据史书记载从 1872 年到 1894 年民族工业仅有 3 家，资本额只有 70 万元。④

1895 年到 1900 年浙江新办的厂矿企业表⑤：

开办年代	工矿企业名称	创办人	所在地	性质	资本（千元）
1895 年	合义和丝厂	楼景辉	萧山	商办	24
1895 年	新城缫丝厂	翁玉轩	新城	商办	未详
1895 年	富阳缫丝厂	翁学坤	富阳	商办	未详
1895 年	公豫缫丝厂		绍兴	商办	未详
1895 年	开源永缫丝厂		绍兴	商办	约 117
1895 年	同和缫丝厂	姚文楠	海盐	商办	未详
1895 年	硖石缫丝厂	叶涛	硖石	商办	约 56
1895 年	余杭缫丝厂	方锡炜	余杭	商办	约 28
1895 年	维大缫丝厂	石蕴真	嘉兴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光裕缫丝厂	姚涌芬	秀水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治经缫丝厂	虞颂南	嘉善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昌大缫丝厂	陆清国	平湖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保经缫丝厂	殷黼华	桐乡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德永缫丝厂	姚文楠	石门	商办	约 281
1895 年	萧山缫丝厂	周某	萧山	商办	未详

开办年代	工矿企业名称	创办人	所在地	性质	资本(千元)
1896 年	大伦缫丝厂	丁 丙 庞元济	塘栖	商办	80
1897 年	世经缫丝厂	“	杭州	商办	420
1896 年	通久源纱厂	严信厚	宁波	商办	450
1897 年	通益公纱厂	高凤德	杭州	商办	533
1899 年	通惠公纱厂	楼景辉	萧山	商办	559
1898 年	机器焙茶厂		温州	商办	未详
1900 年	寿昌煤矿	宁波商人	寿昌	商办	未详

在这一阶段中，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就是“三通”(即宁波通久源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萧山通惠公纱厂)的创办以及杭嘉湖地区丝织工业的发展。

严信厚在宁波开办通久源纱厂，资金 45 万元，于 1896 年开工生产，雇用工人 1800 人，“设有柔钢锅炉三具，以生蒸汽之用，竖身机器足抵 300 匹马力，纺纱厂有抽筒(纱锭)计 11，048 筒，每月出纱 250000 万磅”。⑥这个厂开设头几年，发展较快，盈利丰厚。据报纸报道：“宁郡通久源纱厂，开设有年，生意也畅，现在新添纺织机器，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扩招女工，并造有房屋 40 余间，以备来厂女工居住。”⑦

杭州通益公纱厂，1896 年开建，第二年竣工，资本 533300 元，有纱锭 15000 枚，1898 年产纱 200 万磅，1899 年为 300 万磅。⑧

1899 年楼景辉在萧山开办通惠公纱厂，资金 559400 元，经营颇为顺利，不数年，增机添人，有所发展。⑨

“三通”的创办在浙江震动很大，被称为“最值得注意的事……前途充满希望”。“它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⑩

棉纺织业原是清政府谋求以国家实行直接控制的一个主要产业部门，但是从 1895 年以后，浙江“三通”棉纺厂的出现，充分说明民族产业资本在甲午战后，已逐渐占有优势。

鸦片战争前，中国丝的出口量从未超过 1 万担。甲午战争后增长速度惊人，到 1900 年出口额将近 10 万担。浙江是全国蚕丝生产的主要基地。由于国际市场上对蚕丝的大量需求，这一时期，浙江机器缫丝工业不仅应运而生，而且来了个大跃进，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5 年到 1899 年的短短 4 年中，在浙江共开办了 18 家机器缫丝厂，资本额 2411000 元。⑪

1895 年 8 月，杭州富商丁丙和湖州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地方建立世经缫丝厂，资本 42 万元。“机器用上海磨宜笃公司所制造与怡和洋行制丝所用相同，皆新式也”。“现置 208 个锅，每一锅采丝口六，若用此等锅采丝，一日可制丝一担，……每担价值百两”。⑫。该厂原料来自余杭，品质优良，加以水质上等并经过砂滤，所生产生丝质量比上海好，丝牌西泠桥。同年，开源永丝厂在绍兴曹娥镇创办，股东 9 人，“设有铁制六绪缫丝车 208 台，缫丝女工 208 人，日产丝 100 斤”，该厂厂址适当，水源交通均便，加以工价较上海几乎减半，所以至 1897 年，还是“获利颇丰”⑬。继之，1896 年丁丙等又在杭州塘栖镇建立大伦制丝厂，资本 8

万元。丝车初为208台，旋即扩充到276台，该厂还利用三眠蚕土种茧作原料，茧丝纤度细匀，缫制9/11条份的“金银鹤牌”细厂丝，行销国外，尤为法国商人欢迎⑭。楼景辉于1897年在萧山开办合义和丝厂，资本24万元，有丝车200余部，女工300到350人，营业顺利。1899年增加车锭，扩招妇工，规模扩大。后来在上海北京设有办事处，办理生丝出口业务⑮。此外绍兴、海盐、嘉兴、桐乡、富阳等地也都先后创办缫丝工厂，这是浙江较早的机器缫丝工业。

轮船航运业是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实行国家控制的一个部门，清政府在这个部门的控制主要是针对华商的，所以1895年以前，浙江的航运业几乎为外国航轮和招商局航轮所控制。甲午战后，随着中国航权的丧失殆尽，以及清政府实业政策的转变，华商设立航运公司的各种禁令也逐渐取销了，于是，浙江民办航运业在此基础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895年到1913年，浙江商办航运公司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有14家。共有轮船吨位5533吨和100马力。⑯

航运业的发展，为浙江人口流动，商品交流，对外贸易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据《宁波港史》统计：1896年宁波港的贸易额比1875年增长33。3%，吞吐量增长82.8%，说明甲午战后这个地区的人口流动，商品交流，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面粉工业也是中国近代的主要产业部门之一，在1895年以前，浙江无面粉工业，直到1900年庄涌先在杭州开办利用面粉厂，资本7万元，使用机器磨面，地点在杭州拱宸桥丁浜地方。⑰这是从“零”的突破。

1895年后，清政府也放宽了对私人办矿的限制。这时，浙江的矿冶业也有初步的发展，据《中外日报》1900年5月3日载：“宁郡吴商，前纠股在寿昌县李家粘龙园开采煤矿，现闻该矿产煤颇多，由矿司督率工人，日夕赶采。”

这一阶段，时间只有短短5年，但却办了22个工矿企业，资本额达到3953000元。是前期1872年到1894年厂矿数的7倍，资本额的56。4倍。这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外国资本和商品源源不断输入的打击下，浙江有些民族工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如杭州通益公纱厂，虽领有公款，资本雄厚，但在1900年，“因洋庄不通，掉转不灵，因而停工”⑱。“宁波西式工厂并不是很成功的，很少几家赚钱，多半在开设一短时期后就停闭了”⑲。这说明，浙江新兴的民族工业，在封建势力压迫和帝国主义的竞争下，它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时起时落和波浪式的前进，有些厂矿在1901年到1913年时，又有了复苏和发展。

第二个浪潮

1901年到1913年，这是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浪潮。在这个浪潮中，又可分为1901－1904，1905－1908，1909－1910，1911－1913年等几个小阶段，而以1905－1908年是这个浪潮中的高峰。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在经济上采取了所谓奖励工艺的措施，并于1903年设立了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等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规章条令。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一些阻力。这时由于已办企业优厚利润的刺激，特别是1900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掀起了争取利权运动，浙江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在“抵制外商，争回利权”的口号下，于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开办了一些合股或独资经营

的新企业。

在这一时期兴办的工矿企业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通久源榨油厂，有美国制造的榨油机4台，利用纱厂轧花剩下的棉籽以及收购余姚、绍兴及三北的棉籽，生产棉油和棉籽饼，其副产品为花衣、花壳，有工人100多名，每天榨棉籽10万斤，产品畅销本埠及外埠。这是浙江第一家机器榨油厂。其次是和丰纱厂，资本839200元，工人1885人，有纱锭110600枚，该厂聘请日本技师，选用美国机器，1906年正式开工，每月产纱1万包，所用原料为余姚棉花，产品销售本省及川、湘、鄂、桂等省，利润丰厚。⑳

这一时期浙江不仅新设厂矿增加，产品也骤增并增加了出口额。1900年杭州的土货(国货)出口数是4785371海关两，而1905年却达到了10260623海关两；1901年宁波的土货出口值仅8256海关两，1906竟达到184868海关两。㉑增长了22倍。

然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1908年以后，全国陆续发生几次金融大恐慌，使许多民族工商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办，“富商巨肆，倒闭频闻”。㉒因此1909—1910年间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转向滞缓。有的工厂产品销不出去而停工，如宁波和丰纱厂，1909年“因棉花冬令价涨，所以利息也有所损”。通久源纱厂“今年(1909)只得勉强开销，未能获利”。到1911年两家纱厂均因“生意不佳，棉花价昂，暂行停机，一在7月间停工，一在9月间停工”。㉓杭州通益公纱厂，也因“贸易无甚起色”，以后又困于经济，终岁工作告停”。㉔1901年开办的通利源榨油厂，到1911年因纺织布局停办后，便不得不停闭了。㉕1909年“本口(宁波)洋皂厂、洋烛厂、自来火厂，传云皆属亏本”。㉖不过由于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向比较活跃，加以前段时间所办厂矿以中小型为主，资本额大多在十万以下，因此，全国发生的几次金融大恐慌，对浙江虽有影响但并不太大。除上述几家工厂因资金和原料问题停工外，其他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如针织业、电力工业，都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发展。

从汪敬虞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字可以看出，浙江近代民族工业1909年似乎发展不大，万元以上工厂只有1个。但是1910年又有恢复和发展的迹象。这一年中，万元以上的新厂竟有9个，是1901—1904年的四年所办万元以上厂矿的2倍多。所以，1910年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继续发展的一面，不能笼统地说，1910年还是衰退和萧条的年代，应该说这一年已进入逐渐恢复和发展的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在浙江很快光复，正是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而这种某些行业既有萧条，另一些行业又有发展的矛盾，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特点之一。

1911年以后，浙江最老的宁波通久源纱厂于“1912年9月恢复生产，11月起增开夜工”。㉗和丰纱厂这时也“日夜生产，据云生意甚利”。㉘1913年又增添纱锭1600枚。同年镇海还开办了公益织布厂，资本3万元。㉙设备为新式织布机300架，产品行销本地及外埠。

其次是火柴业，电力工业也有恢复和发展，1911年杭州扩建了光华火柴厂，资本由5万元增加到50万元。宁波正大火柴公司，1913年6月又恢复了生产，并采用德、英及沪产的原料，每年生产火柴1500箱，产品行销沪、杭、芜湖、福州、宜昌、温州、台州等地。㉚

嘉兴永时电灯厂，1911年改为电灯公司，扩大供电范围，资本由5万扩大到10万。㉛1913年温州还开办了普华电灯厂，资本为7万元。这时宁波电灯厂也“添招资本，重新组织，城内电灯，业已复点”。㉜

除了棉纺、火柴、电力等工业部门在辛亥革命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外，其他新建厂矿企业也比较多，据宁波、杭州、绍兴、温州、湖州五城市1911—1913年统计，新建厂矿共有11家。

㉝其中1912年由朱谋先、陆仲芳等人集资2万元，在杭州池塘湾创办纬成丝织公司。㉞为浙江民族丝绸工业开创了新阶段。

纬成公司创办一年就获利，第二年（1913年）扩大资本为4万元。由于纬成公司开办后获利优厚，原来经营丝行、绸庄的商业资本也积极投资新式丝绸工业。当时继纬成之后，陆续创办的丝绸厂在杭州就有虎林绸厂（1912年），庆成绸厂（1912），天章丝织厂（1913）．在湖州有丽华绸厂等。使浙江丝绸工业在短时期内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而这些厂大都采用先进的缫丝织绸机，在丝绸生产事业的革新上起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时期，浙江民族资产阶级从经营轻工业到电力工业。所有这些，都能说明这一时期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很快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浙江地区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和革命运动都有蓬勃发展。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知识界之所以首先觉醒，浙江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活动中心地区之一，也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的。

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

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在这期间新办的厂矿共有61家，资本额6676000元。㉟厂矿数是1872－1894年22年的20多倍，资本额是前期的95.37倍；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当然是大跃进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浙江这一时期创办的民族工业，虽然冲破种种阻力，有所发展，但它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直线上升。而是时起时落，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艰难曲折道路。

第二，这一时期浙江发展的民族工业，主要还是轻工业，其中又是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为大宗，机器工业，万元以上工厂没有，1901年在宁波创办的著名顺记机器厂，资本也只有5千元，仅占和丰纱厂资本额的0.6%。1905年和1906年开办的杭州汇昌机器厂和温州的毓蒙机器厂，资本都是几千元的小厂。电灯厂只有7家，机器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厂矿数和资本额在整个工业比例中微乎其微。所以这一时期浙江开办的民族工厂，轻工业比较有声势，共有工厂50家，占总厂数82%，资本额是6226千元。占总资本额的93.3%。这说明这一时期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轻重工业比例是失调的。

第三，1895－1900年，1901－1910年浙江民族工业的两个阶段中所创办的，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见以下比较的表格：

1895—1900年，1901—1910年浙江创办民族工业情况比较表

年代	厂矿数比较			资本额比较	
	资本额规模（元）	厂矿数	占总厂矿数的百分比	合计资本额（千元）	占总资本额的百分比
1895—1900年	十万上下	5	22.6	305	7
	二十万以上	10	45.4	3648	93
	资本未详	7	32		
	总计	22	100	3953	100
1901—1910年	十万上下	26	93	1391	58
	二十万以上	2	7	1030	42
	总计	28	100	2421	100

从上述表格明显可以看出：1895—1900年所创办的工厂，以大型为主，资本20万元以上厂矿占总厂矿数的45.4%，资本额占总资本额的93%，而十万上下中小型厂矿，仅占总厂矿数的22.6%，资本额占总资本额的7%，1901—1910年所办的厂矿刚巧与1895—1900年相反，以中小型为主，这一时期10万元的厂矿数由上期的22.6%上升为93%，资本额由前期的7%上升到58%；20万以上的厂矿数由上期的45.4%下降到7%，资本额由上期的93%下降到42%。

资本额20万以上的厂矿，大多是官僚、地主、富商和买办创办的，如通久源纱厂的创办人严信厚系李鸿章幕僚，世经缫丝厂创办人庞元济系湖州富商，通益公纱厂创办人高凤德系清朝的候补知府等，他们拥有的资本比较雄厚，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关系比较密切，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因而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企图自上而下，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手段，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19世纪末浙江维新思潮的产生和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经济力增长的反映。

资本额十万上下的厂矿，主要由那些普通工商业者所创办，或城市中的小业主、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转化而来，如宁波顺记机器厂创办人徐荣贵系铜匠出身。正大火柴厂开办人徐惠生系商人、日本留学生。温州毓蒙机器厂创办人李毓蒙原系裁缝，机匠出身。他们一般资金短缺，同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关系较少，或没有关系、这一部分人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同时也受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的排挤和打击，因而有反抗的要求。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出现不少著名宣传家，实干家，女革命家秋瑾是代表这一阶层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版第568页。（甲午战争）系作者加注。

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3页。

③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

④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等有关资料综合。

⑤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浙江丝绸史料》等资料综合制表，并参阅杜洵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附录。
⑥《捷报》1897年7月2日第45页。
⑦《中外日报》1898年9月21日。
⑧报告，1892—1901年，杭州口，第27页。
⑨《中外日报》1900年4月30日。
⑩《捷报》1895年4月26日。
⑪据《浙江丝绸史料》等资料综合。
⑫《论杭州缫丝厂》日本《新报》，1895年11月4日，《时务报》光绪22年(1896)10月21日，12册，第25页译载。
⑬⑭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212—214页。
⑯《宁波港史》第215—216页。
⑰《中外日报》1900年5月29日。
⑱《中外日报》1901年5月18日。
⑲报告，1901—1911年，宁波口，第64—65页。
⑳《宁波港史》第256页。
㉑《六十一年出入口货物价值港引统计表》
㉒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32页。
㉓《关册》1911年中文本，宁波口，第95页。
㉔《关册》1912年，中文本，杭州口第96页。
㉕报告，1902—1911年宁波口，第64页。
㉖《关册》1909年中文本，宁波口第80页。
㉗㉘《关册》1912年中文本，宁波口，第99—100页。
㉙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7编。
㉚《关册》1913年中英文本，宁波口，第993页。《宁波港史》第257页。
㉛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53页。
㉜《关册》1914年，中英文本，宁波口，第848页。
㉝《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1—3页。
㉞沈九如:《杭州纬成公司史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7页。
㉟根据本文所列厂矿表综合。
㊱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81页。